

新辑诗话摭议

——以若干晚明诗话为例

陈庆元

内容摘要:相对于约定俗成、流传既久的传统诗话著作,近年出现一批新辑诗话。新辑诗话是辑纂者从历代(主要是宋代以后)文人的文集、笔记和其他著作采摭若干诗歌理论、诗歌观念和诗评的片段,加以辑纂成编,然后在“诗话”二字冠于作者之名(或其字号)编纂而成的诗话。新辑诗话正文之前通常有原作者小传。新辑诗话小传中原作者的生卒年、里籍,存在不少问题;生平的载述不是缺少原作者与诗歌活动相关的内容,就是较少概括原作者的诗学理论和诗学观念、或概括不准确。某些新辑诗话内容存在误植的现象;诗话作为一种文体,论诗诗不宜滥入。采摭诗话应使用好版本。新诗话的辑录,是替代某个作家编一个诗歌理论、诗歌观念和诗评的选本,而这个选本,不是文章的编选,而是从这个作家的文集、笔记和其他著作中采摭、撷取某些片段,再加以编辑而成的。新诗话的辑纂,要求辑纂者对辑纂对象有较深入的了解,最好是有研究。新诗话的辑纂过程,和其他古代文学的研究一样,存在文献基础的问题。新辑诗话,本质上是一个选本,选家的眼光对辑纂新编诗话相当重要。

关键词:诗话文献 诗话辑纂 《明诗话全编》 选本

《历代诗话》所收诗话,第一种是梁代钟嵘的《诗品》,由梁而历唐五代,第一部有“诗话”二字的诗话著作,是北宋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。宋元明清,以至晚近民国,诗话渐多,研究诗话成为专门的学问,称为诗话学。近年,《宋诗话全编》《明诗话全编》《全明诗话》和《民国诗话》相继问世,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便利。《全明诗话》《民国诗话》所录,均为约定俗成的诗话著作,而《宋诗话全编》和《明诗话全编》,则有所创新,即不仅全录有“诗话”二字的诗话著作和专门谈诗的著作,而且广录诗文集论诗的片段(间或录论诗诗),以人立目,遂成广义的大型诗话辑本。这两种《全编》,有宋一代,五百多家;有明一代,多达七百余种,嘉惠学林,值得大加赞许。《宋诗话全编》和《明诗话全编》是当今新辑诗话的集成之作。

相对于约定俗成、流传既久的传统诗话著作,新辑诗话是辑纂者从历代(主要是宋代以后)文人的文集、笔记和其他著作采摭若干诗歌理论、诗歌观念和诗评的片段,加以辑纂成编,然后在“诗话”二字冠于作者之名(或其字号)编纂成的诗话。纵观近年新辑诗话,佳者固然有,不太完满的居多,粗劣者也间或有之。本文拟对某些新辑的诗话的原作者小传、内容的采摭及诗话文献、诗话辑者的眼光等问题发表一点浅见。为了论述方便,本文所举的例子,多为晚明诗话。

一、原作者生卒年与里籍

有别于旧诗话,《明诗话全编》新辑,每位作者都有一则小传,是一个创举。由于新辑本出自众手,水平参差,有不少辑者原本对所辑对象一无所知,接受任务后仓猝上阵,留下不少遗憾。本文首先论述原作者的生卒年及里籍,然后论述原作者的经历及诗学理论、评论等。

生卒年里籍试举数例:

1. 徐燧生卒年

《徐燧诗话》徐燧生平:“徐燧约(1637前后在世),字惟和,闽县(今福建闽侯)人。徐燧之兄。万历十六年(1588)乡荐。”^①

按:徐燧生卒年并非不可考。《徐燧传》:“生嘉靖四十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寅时。”^②(《荆山徐氏族谱·世系考》)陈价夫《徐惟和行状》:“岁己亥七月,以事之玉田,遘疾而归……至仲秋八日,疾竟不起。”^③徐燧有《己亥除夕是岁有伯兄之丧》^④。喻政《徐燧传》:“卒年三十九。”^⑤综合以上数条,徐燧生于嘉靖四十年(1561)辛酉,卒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己亥,得年三十九^⑥。

徐燧为徐燧(1570-1642)之兄,《明诗话全编》徐燧弟徐燧列于第七册,第7133页,而徐燧兄徐燧反而列在第九册,第9091页。由于不明徐燧生卒年致误,前后顺序的颠倒,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。

2. 马欽里籍与生卒年

《马欽诗话》马欽里籍与生卒年:“马欽(约1624年前后在世),字、里、生卒年均不详。”^⑦按:马欽,字季声,森次子,怀安(今福州)人。万历中乡贡,任潮州判官。有《漱六斋集》《广陵游草》。曹学佺选其诗入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之

①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九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9091页。

②抄本《荆山徐氏族谱·世系考》,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。

③陈价夫:《招隐楼稿》,徐燧选,抄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④《鳌峰集》卷十四,天启刻本。

⑤(万历)《福州府志》卷六二《人文志》。

⑥参见陈庆元:《徐燧年谱》,广陵书社,2014年。

⑦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七册,第7680页。

《社集》。曹学佺《题松石图为马季声寿》：“夫君生年自辛酉，阅世已过六十九……余今五旬仍踰六，著书不成生碌碌。”^①曹学佺生于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马欽长曹学佺十三岁，生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1）辛酉；马六十九时，曹五十六。崇祯十年（1637）八月，曹学佺与马欽等在福州组织三山耆社，时马欽年七十七，详曹学佺《三山耆社诗敬述》^②，与前条合。马欽活到此年或之后。

3. 董应举生卒年

《董应举诗话》董应举生平：“董应举，约（1630前后在世），字崇相，闽县（今福建闽侯）人。万历进士。”^③

按：董应举，字崇相，一字见龙，闽县人，家连江。董应举生卒年非不可考。董应举《先慈马太孺人墓志铭》，母马氏生于嘉靖元年（1522）壬午，马氏年三十六。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应举生，与曹学佺崇祯十年（1637）所作《三山耆社诗敬述·附记》所记“董崇相司空，年八十一”合。又，董应举《己巳寿洪汝含七十嘲其遣妾》：“君年七十我加三。”（《崇相集·诗》）崇祯二年己巳（1629），年七十三，亦与《先慈马太孺人墓志铭》所记合。曹学佺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九月作《挽董司空》^④，则董应举卒于是岁。小传董应举成进士时间亦可补，为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。

董应举（1557-1639）生年早于徐燠、徐爌，由于不明董应举生年，《明诗话全编》列在第十册，反而位于徐燠、徐爌之后，亦误导读者；考得董应举生年，董则应排于徐燠、徐爌之前。

新辑诗话生卒年问题不少，本文仅举三例而已。新辑诗话，弄清作者从生至卒的整个时段是必须的。新辑诗话推断徐燠约生活于崇祯十年（1637）左右，其时徐氏去世已经近四十年，由万历历泰昌、天启以至崇祯，四十年间，诗坛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新辑诗话者不能不察，这个问题，下文还将涉及。

二、诗话作者小传

诗话作者小传，和常见的作家小传、诗人小传有相通的一面，如最基本的姓名、字、号、里籍、科第功名、仕途、著作或代表作、文学主张等，但也应有所不同，因为是诗话作者，小传应当简要介绍作者的诗歌活动，如结社或者在某个流派中的作用、地位（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活动，则从略），概括作者的诗歌理论、诗歌主张、诗评，便于读者在阅读诗话文本之前，有一个大致的、或粗浅的了解。《徐燠诗话》条小传，“乡荐”之后介绍道：

十余年不第。然风流吐纳，居然名士。其诗为张献翼、王百谷所推许。

①《赐环篇》卷下，《石仓全集》，日本内阁文库藏。

②《西峰六四草》，《石仓全集》，日本内阁文库藏。

③《明诗话全编》第十册，第10881页。

④《西峰用六篇诗》，《石仓全集》本，日本内阁文库藏。

著有《幔亭集》^①。

这则小传没有介绍或者交代上文我们提到的某些重要内容，只是说徐燧有名士之风，诗为名流推许，这两个方面与徐燧作为一个诗话作者关切不是十分紧密，或者说对我们了解这位诗话作者帮助不大。小传提到《幔亭集》无疑是对的，但是徐燧还有一部重要的诗歌选集《晋安风雅》，小传没有提及，也可能小传的执笔者不知道有此集，也未读过此集。《晋安风雅》专录有明一代晋安（今福州）一郡诗：“屏居之暇，采辑遗编，搜罗逸刻，得梨枣朽坏之余，起桑梓敬恭之念，摘为一十二卷，总二百六十人有奇。上而格合汉魏六朝，下而体宗贞元、大历，调有偏长，词必兼善者，不论穷达显晦，皆因时采拾，以彰吾郡文物之美。”^②这篇序对明初至万历闽中各期的诗歌有一个纲提契领的评价，故小传不应遗漏。

陈荐夫《晋安风雅叙》：“于是录国家以来，凡吾郡作者，身无显晦，人无存歿，但取其情采适中，声调尔雅，词足千古，体成一家者，得二百余人，诗若干首，名曰《晋安风雅》。”^③“情采”四句，是徐燧《晋安风雅》的选诗标准。综合二序论述，《明史·文苑传》以为万历中年闽中邓原岳、谢肇淛、徐燧、徐爌等人有重振闽中风雅之举。明初在地有“闽中十才子”，弘正间郑善夫继起，足与中原争旗鼓，万历以来，闽中诗人辈出，人各有集，重振旗鼓，与中原争一高低，万历中正是其时。前于徐燧，邓原岳编选了《闽中正声》，徐燧认为其集视野不够广泛，选诗数量也很有限，遂潜心编选《晋安风雅》，以张声势。谢肇淛《小草斋诗话》列数嘉靖、隆庆以来闽中诗人十八位，以为此十数子“各成一家，瑕瑜不掩，然皆裨汉宗唐，间出中晚，彬彬皆正始之音也。南方精华，尽于是矣”^④。此外，他还作有《读明诗二首》《读闽诗三首》《五子篇》（咏陈椿、赵世显、邓原岳、陈荐夫、徐燧）《后五子篇》（咏陈鸣鹤、陈宏己、陈价夫、徐爌、曹学佺）。因此，在撰写徐燧、谢肇淛、徐爌、曹学佺小传时不能离开闽中重振风雅的背景。《明诗话全编》谢肇淛、徐爌、曹学佺小传都写得比徐燧小传好，尤其是谢肇淛小传，可惜以上诸传，都未能将他们置于此背景之中加以介绍。

谢肇淛、徐爌、曹学佺小传作得比徐燧小传好，但也有瑕疵。小传的文字不能太多，对诗话作者诗论的介绍，应当直截了当，得其要领。曹学佺小传提到诗学观念只有一句话：“其论诗崇儒家诗教。”^⑤似乎过于简单。曹学佺除了《蜀中诗话》，编选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千卷，另有文集五十多卷^⑥，诗学思想丰富，晚

①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九册，第9092页。

②徐燧：《晋安风雅序》，《晋安风雅》卷首，万历刻本。

③《晋安风雅》卷首，万历刻本。

④《小草斋集诗话》卷三，日本天保二年（1821）据明林氏耕读斋刊本摹刻。

⑤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七册，第7612页。按：曹学佺卒于1646年，小传误作1647年。

⑥详陈庆元：《日本内阁文库藏〈石仓全集〉编年考证》，《文献》2013年第2期。

明诸家少有能与之比肩者。“崇儒家诗教”，未免失之宽泛，未得要领；仍就儒教言之，曹学佺论诗主“温厚而和平，雍容而不迫”^①，比泛泛说“崇儒家诗教”具体。笔者辑有《石仓诗话》近二百条。曹学佺论古诗、唐宋元及当代诗，颇多独到见解，例如他认为诗歌诸体，五古最难，闽中同社开口便是七律，不可取。这一见解，在晚明闽中诗人中十分独特，传中不能不表。

结社与交游。明人所结诗社，通常是松散的组织，诗社的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成员多寡不一，常有变动，且活动的时间、地点，都带有随意性。诗话作者或是诗社的组织者，或是参与者，他们有时会在结社的活动中发表这样或那样的意见，这些意见，可供新辑诗话的采摭。曹学佺一生组织或参加了不少诗社，晚岁在其乡组织洪山社（学佺，福建闽侯县洪山乡人），甲申之变后，作《序洪山社诗》，略云：“诗不能无感慨，而禅不欲有感慨。诗不能忘今昔，而禅则欲齐死生，其所以有同异处，要在精心者会之。”又云：“非禅之能益诗，乃诗之不能不归于禅也？”^②向来论禅与诗者，多限于诗歌的作法，曹学佺认为禅固然能益诗，但禅也会让人远于世事；诗讲感慨，讲切于世事，禅理固能益诗，但作诗不可归于禅。世变之后，曹学佺希望同里小诗友林崇孚能切记此点于心，厚望莫大焉。如将《序洪山社诗》此条辑入石仓诗话，曹学佺小传不妨加上“晚结洪山社”一句。每一位诗话作者肯定都有交游，小传不可能对他们的交游都作一一交代，徐燉仅活了三十九年，弟徐爌为其撰碑阴，单单福建之外的名单已经多达一百多人。《全编》徐燉小传曰：“其诗为张献翼、王百谷所推许。”^③交游提及张献翼和王稚登二位，或有必要，但同社的谢肇淛、曹学佺更重要，似不当遗漏。曹学佺小传未提交游，同社的谢、徐必须提一笔，因为都是同振风雅的诗。万历后期，钟惺、谭元春竟陵诗人崛起，闽人蔡复一、商家梅、林古度与之游，诗风受其影响；曹学佺也与之游，朱彝尊曰：“能始与公安、竟陵往还唱和，而能皤然不滓，尤人所难。”^④曹与钟、谭游，不为其气习所染，事关诗学观念，小传也当提及。

诗话作者，著作如何介绍？撰写小传时，也应当斟酌。以个人之见，诗文别集，如果只有一种的，当然没问题；有全集者举其全集，有多种别集者，则择其要，胪列一二种。其次，是诗话作者的重要诗歌或者诗文选本。再次，诗话作者所作各种与诗歌相关的笔记著作。最后，是其它有与诗歌评论相关的各种著作。徐燉小传、谢肇淛小传，分别列《幔亭集》《小草斋集》都是正确的；徐燉传不列《晋安风雅》则为缺失。曹学佺小传，列《夜光堂集》而不列《石仓全集》，则存小而失大。《石仓全集》，《明史·经籍志》著录一百卷，以日本内阁文库藏

①《文漪道人诗序》，《西峰用六集文》，《石仓全集》，日本内阁文库藏。

②《瓠馥》卷首，可闲堂汇刻本，日本浅草文库藏。

③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九册，第9091页。

④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二“曹学佺”条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637页。

本最完备,内地各图书馆所藏均不全。小传所列《夜光堂集》,只是曹氏别集数十种中的一种,未必是曹氏的代表诗文集,无特别拈出的必要。至于传中提及的《易经通论》《周易可说》等经学著作,则在可列与不必列之间,依浅见,可不列入。

三、误植与论诗诗的植入

把现成的诗话采入新辑诗话,并作为新辑诗话的主体,最为重要,但是也相对简便,如《谢肇淛诗话》录《小草斋诗话》,《曹学佺诗话》录《蜀中诗话》。然而,新辑或重辑的诗话,其难处却在于“辑纂”的部分,问题最多的也在于这一部分。

如果仅仅辑录一两条,或两三条,不能成编,如《马欽诗话》^①《王志远诗话》都只辑得一条^②,《徐燏诗话》辑得两条^③,恐怕难于成为一部《诗话》;如果真的只有这一两条的内容,不辑纂也罢。《徐燏诗话》仅有两条,而且两条都有问题,第一条:

诗岂易言哉?求其成一家言,良不易易,况备诸体称大家乎?盖工近体者或弱于古风,长古风者或短于五字。即王、孟二氏,盛唐名家,一以清婉称近体,一以风骨雄古风,且各擅所长,况其它乎?(《幔亭集》卷首原序)

“原序”,作者是谁?没有交代。原序可能是作者的自序,也可能是他人之序。经核,《徐燏诗话》所录之“原序”为张献翼之序,而非徐燏自序,属张冠李戴。“诗岂易言哉”云云,是张序序文开篇的一小段话,辑录者可能连一篇三数百字的短序都未读完,便顺手抄摘,录于徐燏名下。《徐燏诗话》所辑录之第一六、一七条,括注出自《重编红雨楼集题跋》卷一所录《闽中诗选序》。《重编红雨楼集题跋》,缪荃孙先生在林佶的《红雨楼集题跋》的基础上重辑,《闽中诗选序》一文也在其中。缪氏之后,今人复辑,亦同^④。《徐燏诗话》辑纂者将此序文析为两条。经核,《闽中诗选序》,实为徐燏《晋安风雅序》,文字小异,如“王检讨辈”,《晋安风雅序》作“王检讨、唐观察泰”,唐泰,闽中十才子之一,《重编红雨楼集题跋》脱。又如“摘为八卷,总二百人有奇”,《晋安风雅序》作“摘为一十二卷,总二百六十人有奇”。是为沿前人之误而误,把徐燏文误作徐燏文植入《徐燏诗话》。

《徐燏诗话》第二条:

踪迹年来混酒徒,独留名姓满江湖。卜居已傍三天竺,处世犹悲五石瓠。刻石好辞传幼妇,闭门高论著潜夫。胸中莫是波斯国,寄得瑶函字字

①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七册,第7680-7681页。

②《明诗话全编》第十册,第10824页。

③《明诗话全编》第九册,第9091-9092页。

④沈文倬:《红雨楼集序跋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3年。

珠。^①

此诗只是泛泛称道胡氏诗而已，属应酬诗之类。一没有评论胡氏诗之特色，二没有展现作者的诗学观念，说它是一首论诗诗，显得勉强。《幔亭集》中，《五君咏》（分咏陈椿、陈鸣鹤、陈邦注、陈价夫、陈荐夫）方可称得上论诗诗^②，第二首《陈汝翔》：

汝翔好奇古，邂逅在柯屿。词藻何离离，才情尤楚楚。能追正始音，不作齐梁语。臭味既已同，素心自相许。嗟乖劳我思，山中正延伫。

陈鸣鹤，字汝翔，家住福州水西柯屿，徐燮住城中，故见面不易。“能追正始音，不作齐梁语”，鸣鹤诗的特点；“臭味既已同，素心自相许”，徐燮说自己趣味与之相同。力追正始音，反对作齐梁语，也是作者的诗歌观念。类似的论诗诗，《幔亭集》还可以辑录一两首。问题是，新诗话将论诗诗也纳入辑录的范畴合适不合适？《徐燮诗话》总共只有两条，其中论诗诗一条；《谢肇淛诗话》和《徐燮诗话》不录论诗诗；《曹学佺诗话》除《蜀中诗话》，辑录六条，全是论诗诗（其中一条为诗前小引）；《王志远诗话》总共只有一条，为论诗诗。这样看来，新辑诗话，有的辑录了论诗诗，有的不辑录。旧诗话与论诗诗，严格说是两种不同文体，即便旧诗话也常有引诗，它还是诗话，属于“文”的范畴；论诗诗偶有小序、小引，就其整体而言，仍然属于“诗”的范畴。

《徐燮诗话》《王志远诗话》篇幅太小，似有“文太少，诗来凑”之嫌。《徐燮诗话》一条误植，一条是诗（还是应酬诗），如果诗不能入“话”，《徐燮诗话》就不复存在；《王志远诗话》总共只有一条，诗不能入“话”，《王志远诗话》同样不能存在了。《曹学佺诗话》有《蜀中诗话》很大的篇幅在那儿，但是曹学佺著述宏富，没有进行补辑，似乎说不过去，于是辑纂者从《崇祯八家诗选》中的《夜光堂集》辑得六条。是不是谢肇淛、徐燮没有论诗诗可供辑录？当然不是。就谢肇淛而言，如上文我们提及的《读明诗二首》《读闽诗三首》《五子篇》《后五子篇》都可辑录，其中前二题，从题目看，就是很正统的论诗诗。新辑诗话的辑纂者在植入不植入论诗诗存在不同的看法。本人以为，新辑诗话还是不植入论诗诗为妥；如果一定要辑录，可以作为诗话的附录；或者，将来可以别辑一部《全明论诗诗全编》，估计部头也不至于太小。如果可以辑入，则应界定何者是论诗诗，何者不是。

四、诗话的采摭

传统的旧诗话，是诗话作者有意识地进行诗话写作，如谢肇淛的《小草斋诗话》和曹学佺的《蜀中诗话》等；新辑诗话，是辑纂者从辑纂对象的诗文别集、笔记和其他著作加以采摭而成的。而采摭的对像，最重要的是诗话作者的

①《得胡御长诗却寄》，《幔亭集》卷七，万历刻本。

②徐燮《幔亭集》卷二，万历刻本。

别集,其次是笔记和其他相关著作。采摭时应使用好版本。

《徐燮诗话》只有两条,一条误植,一条论诗诗,是否就可以不辑纂?辑纂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,而且应该做,徐燮是闽中重振风雅的重要人物,而且有《晋安风雅》《幔亭集》可供采摭。误作《闽中诗选序》且误植入《徐燮诗话》的《晋安风雅序》那两条,可以辑补入《徐燮诗话》。其次,据《徐燮诗话》辑纂者介绍,他们使用的徐燮《幔亭集》为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然而此本只有十五卷,有诗无文,非足本。徐燮过世后,经过徐燮所编的《幔亭集》随即刊刻,由于费用不足,先刻诗,后刻文,全书共二十卷。两刻的时间间隔虽然很短,而流传于世便成了十五卷和二十卷本两种。《四库全书》馆臣很可能只看到十五卷本,也可能两种版本都看到,但弃文取诗,加以抄录^①。《徐燮诗话》辑纂者使用四库本,有诗无文,无从采摭,故付其他文于阙如。

二十卷本《幔亭集》,卷十六为序文,三十七篇,其中序诗者约二十篇,可供采摭。《竹田世咏录序》云:

(唐)最著者,无如李、杜、王、孟、高、岑、钱、刘诸君。然此数君者,或沦落不偶,或沉冥下僚。传于世者,不过藻绩之末,其功业不足称也。如房、杜、姚、宋、裴、韦数公,其勋业烂然于世,乃其诗不少概见。即曲江、燕公有集行世,试取其诗与李、杜诸人絜长比短,不同日论矣。岂功业文章,判若枘凿,而兼之之难哉?则以名公鉅卿雍容廊庙,服劳王家;竹帛旗常,昭垂万禩。即有撰述凌厉作者,然文章掩于功业,故后世徒诵其勋伐,而略其雕虫,有以也。若夫骚人墨士、迁客逐臣,抒情于孤愤,著论于穷愁,只语片辞,惊心动魄。故解颐者多,而声称易噪耳。

此条讲功业勋绩与诗文的关系,唐人中诗作得好的,勋业不济;勋业突出的,诗名不甚。徐燮认为,名公鉅卿的诗名多为其勋业所掩,后世徒诵其勋伐而暂别其雕虫;而迁客逐臣,抒情于孤愤,易打动人心。这一段文字,应当是一条很“标准”的诗话。

《沈从先诗序》云:

从先贫,不能为孺子设榻,但与王生共跣趺几上耳。因得卒业其所著《尊已》《捻枝》《闭户》诸集。乐府、古诗取材于汉,近体得格于唐。要皆抒所自得,意不必古人有,语不必古人道。苟已披之朝华,直咳唾视之,不以烦子墨也。即置之古人中,其谁能辨之?夫诗,所以言志也。从先三旬九食,捉襟见肘,而闭户弦歌,声出金石,此其趣操,列之参宪,曾无异同。未有胸臆古人,而捫管操觚,反掇拾俚仳,落时人窠臼者也。诵诗论世,而其人可知矣。

沈野,字从先,吴人,与徐燮、徐燮、曹学佺友善。此条评沈野诗。沈野贫甚,三旬九食,捉襟见肘,诗皆抒其志,语意必已出,诵其诗,论其世,可知其人其

^①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幔亭集》还篡改了原刻的一些文字。

诗。此条既评沈野诗,又以沈野诗申说“诵诗论世,而其人可知”之诗论。

《缓带编序》云:

不必模拟于唐而自合于唐,其法在有意无意之间,所必传者也。然文章小技,壮夫不为。廷愉业已学剑,不得复事雕虫之技。况当今国家,北苦虏,南苦倭,求猛士如渴。廷愉黄须鲜卑,有河朔健兵之气,犁庭扫庐,扬旌万里,此士之一时也,安得占俳故业,而令马上辈有赋诗退虏之诮乎?廷愉勉之矣。

颜廷愉,即颜容轩,漳州人。少攻诗,入王世贞之门。每奏一篇,世贞未尝不称善,从此名遂大噪于江淮、吴越之间。长于骑射,弃文从武于海上,驻守海坛(今福建平潭)等地,著有《缓带编》。此条结合明代嘉靖以还北苦虏、南苦倭的背景,评颜容轩军旅诗,是一则有特色的诗评。总之,从二十卷本《幔亭集》采摭诗话十条、八条当是没问题的,如果再加上书信等文,可超过十条。可见新辑诗话使用好版本的重要。

上文我们说过,《曹学佺诗话》的辑纂者未见到《石仓全集》,故除了《蜀中诗话》及几首论诗诗外一无所获。《石仓全集》文多达五十多卷,还有佚文,如采摭宽一点,可得诗话三四百条,精一点,亦可得一二百条。曹学佺交游遍天下,万历中曾主金陵社,不仅广交吴越诗友,又与公安袁氏,竟陵锺、谭,乃至缙流羽士都有来往;明清易代之际,曾为叶向高、王思任、钱谦益、夏完淳、王夫之的诗文集或其他著作写过序,论诗评诗常有独到见解,《曹学佺诗话》一概付阙,不能不说非常遗憾。

《徐燊诗话》素材来源有二:《重编红雨楼序跋》和《徐氏笔精》,《小传》提到的《榕阴新检》《红雨楼集》等书未进入编纂者视野,因此《徐燊诗话》也是很不完整的诗话。《榕阴新检》卷十六《诗话》,多达七十四条,每条都有四字(少数三字)的标题,如《山居遗咏》《守杭题咏》等,其中《风流太守》条云:

宋辛稼轩为福州守,所作词甚多,有《西江月》,云:“贪数明朝重九,不知过了中秋。人生那得许多愁。只有黄花如旧。万象亭中置酒,九仙阁上扶头。城鸦唤我几归休。细雨斜风时候。”时有卢国华由闽宪移漕建安,陈端仁给事同诸公饯别,稼轩为酒困卧清涂堂,三鼓方醒,乃赋《满江红》,云:“宿酒醒时,算只有,清愁而已。人正在,清涂堂上,月华如洗。纸帐梅花归梦觉,莼羹鲈脍秋风起。问生得意几何时,吾归矣。君若问,相思事。料长在,歌声里。这情怀只是,中年如此。明月何妨千里隔,愿君与我,何如耳。向尊前,重约几时来,江山美。”稼轩,历城人,可谓风流太守矣。弃官后侨寓铅山而卒。今分水岭下有稼轩墓在焉。^①

辛弃疾宦闽,其集有《七闽之什》,作于福建。此条引辛词二首,以为辛弃疾

^①《榕阴新检》卷十六《诗话》引《竹窗杂录》。

疾是“风流太守”。辛称“风流太守”，前于徐燊，或后于徐燊，都为他人所未道，可备一说。

又《玉岑诗社》条云：

祝时泰，字汝亨，闽人。举嘉靖壬午乡荐，历任德府长史，弃官隐于杭州西湖，筑室以居。与光州守高应冕，承天守方九叙，宪副童汉臣，处士沈仕、王寅、刘子伯结玉岑诗社，人主一山，即景赋诗，时推祝为祭酒。一日登凤山，各赋怀古诗，祝云：“白马南来定宋京，五云长绕凤山城。星随数尽中天陨，潮让沙屯两日兵。辇路独馀春草绿，行人犹说故官名。当年多少难平恨，并作江流万古声。”众作皆弗及也。^①

此条提到的嘉靖间杭州玉岑诗社及其成员、活动场景，可供近时研究诗社者参考。诸如此类，《徐燊诗话》未采摭《榕阴新检》一整卷的《诗话》，是辑纂的重大失误。

《榕阴新检》各卷，也有不少可以归入“诗话”，卷二《忠义》类《疏忤权奸》《太学直谏》条，卷三《贞烈》类《截耳表贞》条，卷六《方技》类《雪逢草圣》条，卷七《名僧》类《诗僧百炼》条，卷八《神仙》类《剑仙再世》，卷十《录异》类《花神托梦》条，卷十二《数兆》类《金梅枯枝》条，卷十三《胜迹》类《喝水岩》《黄蘗山》《芙蓉洞》《宿猗洞》条，卷十四《物产》类《闽中方物》《鼓山细茶》，卷十五《幽期》类《沙阳哭妓》《破镜分离》《玉主报仇》《乌山幽会》条等都是。《榕阴新检》卷十六《诗话》各条，其内容多为诗歌批评，例如《云崩塌势》，评价谢肇淛诗，引郑琰诗为证，说明谢肇淛诗当时为人称诵。以上所举《忠义》等类各条，主旨都比较明确，一部分还有故事，属于诗话中的佚闻佚事之类。

《徐燊诗话》小传提到《红雨楼集》，编纂者亦未见到此集，有其客观原因，因为《红雨楼集》徐燊生前身后都未刻过^②，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，《徐燊诗话》辑者当时欲睹此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2009年，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编入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中的书信约占十之八九。徐燊在他的书信中发表了不少诗歌的见解。徐燊年稍长于锺惺、谭元春，亲历诗坛锺、谭一变，其《寄杨参知》云：“当今诗文一道，大非古人遗轨，诗自锺谭一变，海内争效法之，遂至莫解其义，从风而靡，不能挽回。台翁向所梓集，可称正脉，续稿定当充满奚囊矣。”^③《寄蔡宣远明

①《榕阴新检》卷十六《诗话》引《竹窗杂录》。

②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徐燊兄徐燮曾在金陵为其刻过《红雨楼稿》，其时徐燊二十五岁，是集为其少作，本人也很不满意，徐燊《答王元祯》云：“《红雨楼稿》，是甲午岁先伯兄梓之白门。皆联冠时所作，十分乳臭。门下何从得之？子云悔少作，即此稿之谓也。”（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册六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43册。）

③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第五册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43册。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）

府》又云：“当今海内为诗，多宗楚派，全用之乎也者，人在诗内。伯敬作俑，而效法成风，只为识者唾弃。愿兄熟览古人，参阅王、李诸公，自然名世矣。”^①不论批评是否中肯、得当，毕竟是当时的一种意见。《寄屠田叔》云：“先兄诗草撰述颇多，盖棺之后，某为删润，十去其四，而简佚犹为重大，即敝乡家置一部为难，况能传布海内乎？承教严选，实获我心。明公若不惜针砭，为选二册，尽去应酬，独存近古者，则惟和白骨可肉矣。留念留念！”^②徐燏《幔亭集》为徐燏所选，已经十去其六，刊刻之后，徐燏不满意，认为存留还是过多，应尽去应酬之作，再删过半，存其精华，以流布海内。徐燏致曹学佺书，偶也批评自己的诗，《寄曹能始大参》云：“承示新作，题目佳，而造语亦典实。弟于诗调稍僻涩，少欠情采，在杭已有定评，不知以为然否？”^③此数条都可以入《诗话》。

《鳌峰集》二十八卷，有诗无文；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有文无诗。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之外，还有佚文，某些佚文，也可采入《诗话》。《剑津集序》略云：

予不敏，尝与人论诗曰：五言古，工于汉魏，莫盛于晋。七言古、五言律、绝，工于盛唐，亦莫盛于盛唐。惟七言律，至我朝而始工、始盛，足掩三唐作者，宋元无论矣。昔人评文，以昌黎为起八代之衰，至我朝亦始工、始盛。予友邵肇复先生以《易》起家，少年联弟进士，由大行铨曹晋西蜀参藩、两浙观察，輶轩所至，或故都古迹，必凭吊悲歌；乞假林居，或宴客开尊，必分题角韵。盖自释褐以来，吟草不下千首，选其粹美，皆赅入唐人之室，而七言极工极盛，尤号长城。^④

邵捷春（？-1642），字肇复，一字见心，侯官人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进士，历官都御史，巡抚四川，兵败下狱，仰药死。有《剑津集》《入蜀吟》。邵捷春与徐燏同为闽中诗人，此序论提及诗歌史上七律发展的问题，按照徐燏的说法，唐诗除了七律，各体都可称鼎盛；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，而七律到了明代始工，意即明七律超迈李唐。同社中邵捷春七律尤佳，唐韦应物称“五言长城”，邵捷春七言律极工，可称“七言长城”。盛称邵氏七律，实则是极力肯定晚明闽中诗人的七律。晚明闽中诗人作诗大多动辄七律，追求工稳妥贴，不可否认，闽中不少诗人七律作得不错，邵捷春就是其中一位，但或应酬、或应景，不勉有落入熟套之嫌。同时代的闽中诗人的曹学佺对此有所批评，清初周亮工入闽，也有论述。这方面的问题，我们将另文详述。“七言律，至我朝而始工、始盛”的观点固然有偏颇，但作为一家之言，辑录诗话，此条就显得比较重要了。

①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第七册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44册。

②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第三册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42册。

③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第六册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第43册。

④《剑津集》卷首，崇祯刻本。

五、文献基础与辑纂者的眼光

新辑诗话的篇名或书名,通常以诗话作者的姓名来命名,一目了然,如上文所引《徐燧诗话》《谢肇淛诗话》等,也有用作者的字号来命名,如笔者所辑《兴公诗话》^①,兴公是徐燧的字,后进学他的诗,人称“兴公诗派”。同时他又是藏书家;兴公,治明诗或治目录学者耳熟能详。新辑诗话,有一种是全部内容由辑纂者新辑,如《董应举诗话》;另一种是先录已有的诗话,后再补辑,如《谢肇淛诗话》(谢肇淛已有《小草斋诗话》)。新辑诗话各条都是从原作者的诗文别集、笔记或其他著作辑出的,代古人辑纂其诗话,前人也做过类似的工作^②。新诗话的辑录,本质上是替代某个作家编一个诗论、诗歌理念和诗评的选本,而这个选本,不是文章的编选,而是从他的文集、笔记和其他著作采摭、撷取某些片段,加以编辑而成的。多数新编诗话各条都没有标题,本人所辑《兴公诗话》,由于受到兴公《榕阴新检》的启示,各条都冠有标题。严格说,新辑诗话,是辑纂者代某个作家编的一部诗话,如果这个作家还活着,或者虽然他不在,在他的版权归其亲属的期限内,我们编完诗话,还得征求他本人或版权所有者,看看你所编的东西,作者本人或版权所有者是否同意,然后才有可能出版公诸于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辑诗话的原作者,都早已不在人世了,可以免掉这一程序。尽管如此,辑纂也应当为原作者着想,想想你所辑纂的这个诗话,所收各条是不是原作者论诗评诗最精彩的、最能代表其本意的那些部分?你编的这个诗话有没有误入滥入的?是不是存在大量失收、漏收的状况?假如原作者还活着,他看到你辑纂的诗话会不会满意?因此,新诗话辑纂的进程也是一种研究的过程,辑纂而成的一部诗话,也是一种研究成果。

新诗话的辑纂,既然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科学研究的范畴,就存在文献基础的问题,存在研究眼光的问题。

先说文献基础。新诗话的辑纂过程,和其他古代文学的研究一样,存在文献基础的问题。新诗话的辑纂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,找一两本书辑纂对象的书抄,能抄多少算多少。其实不然。研究对象相关文献的搜集是第一要义。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,基本文献的失缺,何来采辑?上文已经提到的《徐燧诗话》,使用《重编红雨楼集题跋》及《徐氏笔精》两种,未使用《红雨楼集》《榕阴新检》;《重编红雨楼集题跋》《红雨楼集》还有不少佚文,如《剑津集序》《还山草序》《游鼓山诗序》等^③,都可供采摭。版本的选择,也有关学问,《幔亭集》二十卷本有文可采摭,十五卷本有诗无文;从十五卷本辑诗话,无异于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

①陈庆元、陈炜辑校:《鳌峰集》附录,2012年。

②如张宗柟纂辑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。

③陈庆元:《〈红雨楼序跋〉补遗》,《文献》2009年第3期。

新诗话的辑纂,要求辑纂者对辑纂对象有较深入的了解,最好是有研究。纵观新辑诗话,一部分辑纂者对辑纂对象并无太多了解,更谈不上研究,少数学人恐怕连对辑纂对象的诗文集都没有翻过,仓猝操笔,例如《徐燮诗话》,总共辑得两条,一条是误植,一条是应酬诗,小传生活年代也错得离谱,对研究对象一无所知的《诗话》,不辑也罢,辑纂成编,可能还会贻害后学。对辑纂者有一定的研究,除了对辑纂对象的生平著作要有大致准确的了解之外,对辑纂对象的诗学理论、诗学观念、诗评也应有所掌握。如果对辑纂对象一无所知,或者知之甚少,甚至是错误的认知,这个《诗话》如何辑纂?

新辑诗话,本质上是一个选本,选家的眼光对辑纂新编诗话相当重要。新辑诗话是从原作者的文集、笔记和作者的其他著作辑纂而来的。辑纂不是见文便录,在“辑”之前,还有一个“选”的程序。严格说,辑纂,是选辑,是选后的辑和纂。因为是选,就有一个选家眼光的问题。这和人们经常讲的选诗、选文的道理是相同的。我们讲的诗文选本,一般说来是一篇诗、一篇文的选(个别有节选)。诗话则是从一篇文中再节选出一段或几段,再进行辑纂。一个作家或诗人的选本或选集可能有多种,甚至几十种上百种,为什么选本会出现差异?因为选家的眼光不同,好尚各异,选本或选集的面貌也就千差万别。目前,新辑诗话的工作刚刚起步,不太存在一诗家有多种新辑诗话的现象,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两种,如《明诗话全编》中有《徐燮诗话》《曹学佺诗话》,笔者有《兴公诗话》和《石仓诗话》^①,不是说笔者作的一定就好,其他学者作得就不那么好或不好,笔者的本意是,既然有两种相同的诗话辑本,就有两位选辑者不同的眼光。再举例说,《徐燮诗话》,《明诗话全编》的辑者误植一条,其实是应酬诗被当作论诗诗辑入的一条,这也是辑纂者的眼光。笔者编《幔亭集编年校笺》^②,暂时还没有涉及到辑纂《幔亭诗话》的工作,但如果编他的诗话,当然会体现笔者的见解。《幔亭集》卷十六序文相关诗论的文章二十来篇,笔者不会每篇都加选辑,可能只选十多则;同时还会在他的《晋安风雅序》、书信等选若干则。选徐燮的标准之一,就是对事关重振风雅的那些文字,会有更多的关注,这就是徐燮的诗话,也就是《明史·文苑传》所说的重振闽中风雅的徐燮的诗话。

【作者简介】陈庆元,男,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特聘教授、福建师范大学教授。研究方向:明代文学。

①陈庆元、陈炜辑校:《鳌峰集》附录,广陵书社,2012年;陈庆元《石仓诗话》,陈庆元辑校《石仓全集》附录,人民文学出版社,即刊。

②陈庆元:《幔亭集编年校笺》,待刊。